

薛涛小诗系史实

郭祝崧



薛涛生于长安,随父母入蜀。为时不久,其父病故嘉州,涛遂投身为“营妓”以养母,从而到西川首府成都居住。她自幼即得其父教导,擅长作诗,故获名帅、大臣、秀士青睐,甚至获得“校书郎”借称。薛涛中年,在浣花溪百花潭畔建吟诗楼居住,并就江水创制小页诗笺,得名“薛涛笺”行世。

就传世的历代妇女诗作看,王蜀花蕊夫人和薛涛所吟最多。花蕊《宫词》及另8首,总数虽然超过涛作30首,但其内容却仅涉宫廷情景、嫔妃宫女生活、朝拜神祇,远不及涛诗谈说的方面众多。笔者读《薛涛诗集》,多增识见。兹谨列数例如次。

一、摩诃池广,足可泛舟

薛涛奉陪萧中丞泛舟成都皇城外边的摩诃池,吟诗“昔以多能佐碧油,今朝同泛旧仙舟。凄凉逝水颓波远,惟有碑泉咽不流”(《摩诃池赠萧中丞》)以献。萧中丞名祐,字佑之,丞县兰陵镇人,史籍盛称其为人正直。唐宪宗元和初,祐出任西川节度使府判官,佐军幕,转升王朝御史中丞返京。

摩诃池存世颇久,直至距今30年前始失行迹。池在成都老城中央,传为隋朝蜀王杨秀开凿。《方輿胜览》记:“隋王秀取土筑广子城,因为池。有胡僧见之,曰:摩诃宫毗罗!盖梵语呼摩诃为大宫,毗罗为龙,谓此池广大有龙耳。”《蜀棹机》记有“王建武元年,改摩诃池为龙跃池”;《王氏开国记》且说:“建将薨前二月,摩诃池有爱居来集。衍即位,仍改龙跃池为宣华池”。按:《尔雅·释鸟·疏》:“释曰:爱居,海鸟也,大如马驹”;郝懿行义疏,称“樊云:似凤皇”,足见摩诃池颇大,方能引来如此巨大飞鸟。

陆游还说:“摩诃池入王蜀宫中,旧时泛舟游此池,曲折十余里。至宋世,蜀中后门已为平陆,然犹呼为水门也。”明朝后期,曹学佺《蜀中名胜记》说:“今此池填为蜀藩正殿,西南尚有一曲,水光涟漪。”

隔岸林木翳翳,游者寄古思焉。”薛涛所吟泛舟摩诃池诗,倒给今人以深刻印象:成都中城繁华地带皇城坝天府广场后面,原来是泛舟游冶所在啊!

二、校书郎分实职、虚职

薛涛《赠段校书》诗语表明系赞誉段成式所吟,当在唐穆宗长庆元年至三年间。《新唐书·段志玄、文昌传》记有:成式“侍父(时任西川节度使)于蜀,以田猎自放,文昌遣吏自其意谏止。明日,以雉兔遍贻幕府,人为书,以所获俚前世事,无复用者。人大惊。《玉堂闲话》更就此事加说:“诸客齐诣文昌,以书示之,始知其子艺文该赡。《该文录》甚至指称,获赠者对成式书文“多不晓其义”。

涛诗语为“公子翩翩说校书,玉弓金勒紫绶裾。玄成莫便骄名誉,文采风流定不如。”语意当为奉劝成式,宜以汉朝韦贤丞相的少子玄成作榜样,切勿自以为好武更好文而文采风流无人能比。须知自己实际远不及父亲。

五代孟蜀何光远《鉴戒录》说:“薛涛者,容仪颇丽,才调尤佳,言谑之间,立有应对。大凡营妓,比无校书之称,自韦南康镇成都日,欲奏而罢,至今称之。”元朝费著《蜀笺谱》:“中令议以校书郎奏请之,护军曰:不可,遂止。”盖不可视为史实之谈。

校书郎职始设于汉朝,兰台、东观,俱有收藏典籍的专室,置学士典校;又专设郎官主管,称校书郎。唐朝秘书省、集贤院各设校书郎,职司校勘典籍,订正讹误。秘书省校书郎为正职官员,定额8人。集贤院校书郎则为“文散官”,由应获父荫而未

经科举中试入仕的勋贵子弟挂名,以待受实职。

段文昌早年旅蜀,得韦皋表授节度使府校书郎,赓即自行离府还乡,足见所获当系虚职。其后,宰相李吉甫器之,擢登封尉、集贤校理,再迁左补阙,而后逐步升迁。集贤院校理,就是实职校书郎。李吉甫的儿子德裕,也是先以父荫补授校书郎,而为集贤院散官,随即再转秘书省实职校书郎,复擢升翰林学士。由此可知,薛涛所吟《赠段校书》和《赠韦校书》,均当如陈振孙《书录解题》所说,涛系“褒借为戏,如今世白帖、借补之类耶”。段成式自称“开成初,予职在集贤”,更为薛涛身后15年事。

此诗中紫绡裾为猎服,不是车帷。

三、坤道服饰属时世妆

史籍记载:梁武帝皇侄萧思遇每逢迎宾,必换道装;王勃被贬居蜀,日穿道服;顾况暂居终南山待诏入仕,亦以道服为常服。

至薛涛吟《试新服裁制初成》七绝三首,却被谈说者认定为涛“弃俗入道”的证据。也曾有认为女子、尤其是营妓更不当入道者。不过,晚明李贽《焚书·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则表示,妇女穿着道装自无可,毋须关注。

薛涛诗《试新服裁制初成》为:一、“紫阳宫里赐红绡,仙雾朦胧隔海遥。霜兔毳寒冰茧净,嫦娥笑指织星桥。”二、“九气分为九色霞,五灵仙驭五云车。春风因过东君舍,偷样人间染百花。”三、“长裾本是上清仪,曾逐群仙把玉芝。每到宫中歌舞会,折腰齐唱步虚词。”钟惺、赵世杰皆明确指出“长裾本是上清仪”;“偷样人间染百花”诗语,乃是“只将借意发出正意,情神宛肖”,造语能“出奇致胜”。也就是不当据之认定薛涛立意弃俗出家,而是借坤道服饰华丽,制之穿着以娱情郎。

汉朝刻存的仙女造像,服饰就极鲜艳,晋朝、唐朝的“飞天”衣著,尤显胸腹裸露。敦煌石窟《霓裳羽衣曲》画像,就兼具这两项特色。唐朝宫女以道装作歌舞服饰,晚唐年间竟自成为后宫常服。五代前蜀王建自称继承李唐基业,也就以道装充后宫常服。花蕊夫人《宫词》说是“后宫一例罗冠子,新样交刊白玉花。欲试澹妆兼道服,面前宣与唾盂家。”澹妆的澹,不同于“淡”——色采浅淡,而是淡薄飘逸。王衍《甘州曲》就曾吟及澹妆的形制:“画罗裙,能结束,称腰身”,着之者显得“柳眉桃脸不胜春,薄媚足

精神”!

“偷样人间染百花”者,未必是一般民家妇女,因为坤道服饰必然价高,贵家妇女才可能制作穿之,用以显示己身华贵艳丽。孙光宪《北梦琐言》记“浙江周宝侍中博陵崔夫人,乃乾符时相之姊妹也,少为女道士,或云:寡而冠披,自幽独焉。”黔南节度使王保义有女适荆南高从诲之子保节,未行前,暂寄羽服。”其实据皆系缘于“冠披”、“羽服”为“时世妆”所致。《枫窗小牋》记,一妓女着艳装于太平兴国寺牡丹丛中招引男子,自慨系“欲借弥陀惜小春”;《情史类略》所记,李冶、鱼玄机为妓而着道装,更系借以在众多妓女中“争取最前筹”。

如此看来,薛涛的穿着道装,不能撇开她自吟



张大千:《薛涛制笺图》

文苑漫步

文史杂志

的诗语,去认定她是“入道”而为之。

四、小诗确指范晔史误

薛涛出游嘉州,吟有《题竹郎庙》:“竹郎庙前多古木,夕阳沉沉山更绿。何处江村有笛声,声声尽是迎郎曲!”涛虽系为抒一己之私情而吟,却大大地佐证了范晔一项史误。

范晔《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夜郎侯迎降,天子赐其王印绶,后遂杀之”,并定其时为汉武帝在位。但是,《汉书》记述,武帝之后110年的成帝年间,夜郎国、夜郎侯还自存在,而且时不时地入寇汉地。

范晔在世晚于常璩约一百年,其书中记及《史》、《汉》所不提及的竹郎、竹王,当系见及常璩《华阳国志》所致。可他却又将《史》、《汉》所记唐蒙斩杀夜郎侯,与常书所记唐蒙斩杀竹王,两相混同,致使竹王成了夜郎侯。于是,就出现了汉王朝斩杀了夜郎侯,又立庙予以奉祀。其实,唐蒙的斩除夜郎侯,在于夜郎侯国时的寇掠汉地;而其斩除竹王,则由于其开辟柯,该地诸种侯王服从,而竹王单独峻拒所致。竹王被唐蒙斩杀之后,其国民人,也就是夷、濮族众阻城,咸怨诉竹王非血气所生,以致不愿拥戴王朝;他虽当斩除,却不当灭国,应立其子承继王位以存其国。稍后,吴霸继唐蒙治理越巂,获知竹王国人愿望,遂上表奏请皇上封竹王第三个儿子为侯以继承遗位。常书后文曾说及竹王三子死后“配食父祠”,可见竹王被斩后竟获汉王朝允许立庙奉祀,足知王朝对唐蒙斩除竹王是予以否定的。

竹王不是夜郎王,竹郎王国不是夜郎王国,薛涛《题竹郎庙》就是有力佐证之一。因为在历代史籍均予蔑称的夜郎国君王或夜郎民人,怎会得涛视作情人?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引录雷金流教授1947年发表的《云南潞江罗罗的祖先崇拜》、《滇桂之交白罗罗一瞥》二文,说是云南、广西两省交界处和潞江地区的罗罗族(按,今称彝族)崇拜竹神,每以一丛“金竹”、“兰竹”作为种神奉祀,以祈福和求生子嗣。雷文所称“罗罗”族所在黔、滇、桂、湘、鄂五省各地,共有一百多座竹郎庙,且都远离夜郎故地及其夺占之地。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在谈说薛涛诗篇时,还提及荣州有竹郎庙,而嘉、荣二州均非夜郎国曾经侵占之地。此外,《太平寰宇记》说大邑有竹王庙;《元丰九域志》说邛州有竹三郎庙;《唐音辑注》

说邛州竹郎庙时,还说竹中所出为“三儿”;清朝文士说怀州云顶山有竹王庙(现今仍为旅游胜地)。今成都市东郊的四川师范大学所在地,原本也叫竹王山,山间还有残庙遗迹,车站站牌仍称“竹王山站”。

如此看来,薛涛所吟《题竹郎庙》正是佐证范晔失误的有力依据。

五、诗语自证其为贗品

《薛涛诗笺》收录《送郑资州》,按语称:“题集作《送郑眉州》,据《万首唐人绝句》改。”《全唐诗》所收,题作《送郑眉(一作资)州》。诗语为:“雨暗眉山江水流,离人掩袂上高楼。双旌千骑骈东陌,独有罗敷望上头。”近年谈说涛诗的学者,颇多盛赞此作为《洪(宏)度集》名篇,因为诗语表明涛自言其为州守夫人,故尔唐朝文士称之为“营妓”,应属“妄加诋毁”。有的学者说,唐人诗文中,只有谈及资州守郑纲(钢)的,无谈及眉州守有姓郑者,所以涛当是郑纲夫人。有的学者更以此诗表明罗敷系州守夫人,因而汉朝乐府《陌上桑》以罗敷为民妇失实,倒是宋朝初年面世的《秋胡变文》以罗敷为州守夫人确切。有的学者则据此诗认定唐朝州守同于汉朝州守,俱兼统军政和民务,而非唐朝州守只管民不统军。

但是,正由于学者们共同以之为论据的诗语“双旌千骑骈东陌”,却恰好可自证其为贗品,而非薛涛所吟。

汉朝武帝元封五年之前,各朝的“州伯”系王朝赐予大臣的“封号”,并非地方长官。该年,王朝方在州郡设置职位、权势不太高的州官,名号“州刺史”。成帝绥和元年起,王朝为防地方动乱,加大州官权势,改称“州牧”,皆由王朝敕任,都只理民政,不涉军务。东汉晚期,农民起义频繁,朝廷为此派遣宫廷大臣出任州牧,兼统军务、民政,以便于镇压。灵帝、献帝年间,实力强大的地方军政首长自封州牧,皇上皆以认可。晋朝立国之初,惩东汉失政,遂撤州牧,复刺史官称,即夺军权,只理民政。隋、唐之际,更仅留京都近处雍州州牧名号,借供封赠皇室近亲,而且只是“遥领”,并不“实任”。初唐年间,王朝又进一步地削弱地方权力,大增州数以缩小州守统领地带,一再严限其只理民事。王朝又在地方重置都督统领官军,新设团练使、守捉使、度支使、盐铁使等等,分管地方武装、财务、工业生产之类,也是分化州守权势。汉武帝时,全国仅有十三州,薛涛吟

颂李德裕诗语“壮压西川四十州”，则已表明其时单是西川所辖之地，就已达该数的三倍。州守既不统军，眉州、资州又都是西川、东川的小州，所统皆只一二县，何致有《送郑眉(资)州》诗语所说的“千骑骈东陌”？

旌、节，始置于东汉晚期，由皇上亲手赐与所任州牧，用以代表王朝皇帝行事，“旌以专赏，节以专杀”。其时，获赐单数者称作“单车刺史”，只理民政；获赐双数者，则兼统军务、民政。自晋朝到唐朝初期，皆不让州守统军，故不再授旌、节予州守。唐高宗永徽年间，为使统领地方军务的“都督”在行军途间得以与本辖之外的官军联系，遂再实行旌、节统军制度。此类都督，先称“都督”，稍后改称“节度使”，但都不是王朝官职正称，而为兼称。唐睿宗景云二年才将节度使定作正式官职，得任者兼封“郡王”，获封时须入朝谢恩，陛见之际由皇帝亲手赐予双旌双节。玄宗天宝年间，王朝加大节度使实权，使

之统揽军务、民事、财政、司法等等事宜，还可奏请朝廷任命其自选僚属和州县长官。节度使因故失去旌、节，即自失职位；未得皇帝手赐，而从其他渠道获得旌、节者，则属僭越叛逆行径。

眉、资两州本属内地小州，只统一二县，其州守绝无可能径升镇帅节度使，拥有双旌双节而统军千骑。两《唐书》、《资治通鉴》等史籍，就无州守径升节度使的记述。郑纲(纲)其人其事，也不见有史籍记述，只见于羊士谔《寒食宴城北山池即故郡守荥阳郑纲(一作纲)目为折柳亭》中。羊士谔，泰山人，唐德宗贞元元年中进士第，历任宣州、歙州巡官；宪宗元和初，拜监察御史，后以坐诬丞相李吉甫被罚出京任资州刺史。羊诗即吟于资州，其时郑去世已多年。羊年略长于薛，郑则远长于薛。何况，西川营妓不可能侍奉东川官员于东川；东川官员的妻室，更不可能于其夫逝世后，被西川收作营妓。

作者：四川师范大学(成都)退休教授

北京
李代祥

江上并非江岸

北宋范仲淹的名篇《江上渔者》与唐李绅的《悯农》诗一起，都被收进小学语文“课标必背七十首”中。这首语言朴实、形象生动、对比强烈、耐人寻味的小诗，反映了渔民劳作的艰辛，与《悯农》一样，唤起了人们对民生疾苦的关注。该诗中的“江上往来者，但爱鲈鱼美”已成名句；但对本诗中的“江上”的解释，各家却大有不同。

人民教育出版社网站的刊文在对本诗的简介中

说：“首句写江岸上人来人往，十分热闹。次句写岸上人的心态，揭示‘往来’的原因”，可见，是把“江上”释为“江岸上”的。《漫画唐诗宋词》(中国网挂历版)则将此句解释为“江边往来的旅人”，这里“江上”被解释为“江边”。“江边”虽然字面上与“江岸”不同，但实际与“江岸”无别，都指江的外面或岸上。事实上，这种解释抛开了标题“江上渔者”。同一首诗的两处“江上”，其实并没有什么差别。如果把标题“江上渔者”联系起来看，就不难理解：“江上”就是江上(即水上)，并非江岸。诗歌的正解当为：江上

往来的过客只知喜欢鲈鱼的味道鲜美；殊不知却是江上打鱼的人们乘着小舟在风口浪尖上拼了身家性命打来的。

正是这种鲜明对比，才获得了强烈的情感效果。释“江上”为“江岸”，失当。

(注 人民教育出版社刊文网址：<http://www.pep.com.cn/200406/ca465718.htm>)

作者单位：新华通讯社(北京)

天性

关于“略识之无”

岳麓书社版《辜鸿铭文集》(冯天瑜点校)中云：“我乡有一市侩，略识之，无为谋生计，设一村塾。”其中“之无”间断逗，误。

白居易《与元九书》云：“仆始生六七月时，乳母抱弄于书屏下。有指‘无’字、‘之’字示仆者，仆虽口未能言，心已默识。后有问此二字者，虽百十其试，而指之不差。”这里白居易是在说他早慧。后人遂称不识字或少识字为“不识之无”或“略识之无”。冯天瑜先生似乎忘记了这一不算冷僻的典故而断“略识之无”为“略识之，无”，令人惋惜矣！